

中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丛书

张曙光 苏长和 主编

大国国际组织行为研究

武心波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丛书

张曙光 苏长和 主编

大国国际组织行为研究

武心波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国国际组织行为研究/武心波主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中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丛书)

ISBN 978-7-208-09602-8

I. ①大… II. ①武…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 IV.
①D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6305 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封面装帧 王小阳

大国国际组织行为研究

武心波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5.75 插页 4 字数 194,000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9602-8/D·1796

定价 32.00 元

丛书主编:

张曙光 苏长和

编委会成员 (按拼音顺序):

陈宗翼 (Gregory Chin) 约克大学

崔大伟 (David Zweig) 香港科技大学

范蔚文 上海人民出版社

江忆恩 (Alastair Iain Johnston) 哈佛大学

康怡安 (Ann Kent)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门洪华 中共中央党校

秦亚青 外交学院

沈丁立 复旦大学

时殷弘 中国人民大学

苏长和 上海外国语大学

王逸舟 北京大学

王正毅 北京大学

张曙光 上海外国语大学

本书出版得到上海市重点学科国际关系 B701、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部 211 三期项目及上海外国语大学大国国际制度“外交比较与国际体系变迁研究”项目的资助。

丛书总序

组织世界 以本领之

王国维尝从中外关系视野下总结中国学术的三个时代，认为晚周诸子学说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中古时期的佛学传入，为我国思想之受动时代，因宋儒调和，又兼带能动之性质；而今西洋思想东渐，又有佛学所没有之强大物质力量相配合，中国思想之受动影响，不亚于中古时期，此受动如何转化为能动，任务艰巨也。

此三个时代类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同样贴切，与梁任公所谓“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三说，有异曲同工之处。近代西人挟思想与物力，几横空出世于中国，中国传统天下观念迅疾天崩地裂，陵谷变易，殆失自尊，不要说能动中达济天下，在受动中独顾其身，怕都没有回旋的空间。

大国非仅强大物力之谓，有组织世界之灿烂学术和思想也！今日中国与世界正发生前所未有之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借改革开放之雄风，我国国力蒸蒸日上，势不可挡。然真正在相互交织的世界中，做到寓受动于能动，需有物力之配合，更得以思想和制度来组织世界，以本领之。要求得“本领”，非一门学科所能为，需要各个知识门类百花齐放，相互借力、接力、刺激。国际关系学顺应中国参与国际社会之进程，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最快也是中国成为全球

性大国最为需要的一门学科,应该为中国能动于世界,贡献更多的思想和理念。

此为我们出版“中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丛书”的旨意所在。这套丛书循着这样的思路开展。第一,研究具体的国际组织及其与中国的关系;第二,研究国际规范和规则及其与中国的互动;第三,研究中国如何组织世界秩序。因此,这套丛书绝不限于具体的国际组织研究,丛书落在国际制度层面,立意在于“中国如何组织国际关系和世界秩序”上;丛书也不囿于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我们希望与主题相关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律研究等成果的加入;丛书志在博采中外之长,遍览古今幽深,凡有参考借鉴之说,也作移译并纳入。

丛书可能谈不上“奇文共赏”,但一定坚持“疑义相析”的原则。同则不继,和则生物,唯有兼容并包、求辨析疑之精神,学术才能步步推进,薪火代传,与时俱进,显示其强大生命力。因此,我们期待在前学后进的爱护和支持下,共同办好这套丛书,为中国国际关系学进步,贡献绵薄之力。

丛书出版大部分得到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部 211 第三期项目和上海市重点学科 B701(国际关系)资助。国际组织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重点特色研究方向,研究院全体研究人员为丛书编辑贡献良多。上海人民出版社向来倾力支持中国国际关系学术出版,成绩在学界有目共睹。谨对以上个人和机构的贡献,表示真挚的感谢。

是为序。

苏长和

2009 年 7 月 1 日展于沪北寓所

前 言

“大国国际组织行为研究”是上海外国语大学 211 三期项目的重点学科建设课题,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组织特色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

在国家间相互依赖不断深化的世界政治中,国际组织在各个议题领域均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治理功能。在此背景下,国际组织外交成为大国对外关系行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既包括大国对待国际组织的态度,以及在行为上所体现出的在国际组织框架下的多边合作和治理实践,也包括大国与国际组织、规范和规则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大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日益密切,大国的国际组织行为活跃而富含深蕴。为此,加强对大国国际组织行为的关注和研究,有着学理上的迫切需求。

这些天,国内各大媒体均在热议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上升问题。中国在“经济联合国”中确立了自己世界三强的地位。我想,从中国对国际组织的疏离到积极参与,到现在与国际组织关系的密不可分,以及在国际组织中积极进取和影响力不断增强这些事例,是否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国的成长都与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密不可分,它们彼此相互借重并相互需要着。同样,这一鲜活的事实本身,是否也能同时用来佐证本课题所具有的

现实意义呢？尤其是对中国来说！

当然，选择这个课题还与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过去的历史与近几年的求新求强之变化有关。相对而言，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的强项历来是区域与国别研究，这是因为上海外国语大学具有多语种的外语优势，且科研人员大多在不同国家有较长的留学和工作经历。2006年，上海外国语大学成立了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我院以此为契机，重新凝练了方向，选择将国际组织研究确定为科研的一个新的主攻方向，在保持原有研究特点以外，力求能够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当然，如何将国际组织这一新增方向与我院传统的国别研究优势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国别研究和国际组织研究寻找良好的结合点，是我院科研人员建院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2007年，我校211三期项目启动，苏长和院长提出是否能从大国的国际组织外交行为的角度，研究大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我们根据这一提议，向学校申报了同题目的课题。课题很快获得了批准，被列为我校211三期项目和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课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该课题的完成和本书的出版也是本人以及我院科研方向求新求变后的成果之一。

本课题对大国筛选的标准比较简单，入选对象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再加上德国、日本以及“金砖四国”中的印度和巴西。大国国际组织行为研究是一个比较新的选题，目前国内还未见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系统研究，有一定的难度，至于要做详细的学理比较研究，似乎更少。正因为课题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对我们来说，它既是挑战，又有很大的吸引力。

大国的国际组织行为，主要体现在大国国际组织的外交行为上（当然也和内政分不开）。伴随着国际社会的成长和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的发展，大国对国际制度与国际组织的态度和行为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而这种变化又因各国的国情与历史文化的不同，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与风貌。为此，我们对该课题达成的基本共

识是：将大国与国际组织的关系放到大国成长和国际组织发展变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双向互动这一历史流变中，从大国对待国际制度或国际组织的态度与行为等多个侧面进行考察，力图探析各大国在国际组织外交中态度和行为的共性与特性。

我们以项目为纽带，跨学科跨院系跨学校地组织了一支由9位学者组成的课题队伍，大家聚集在一起，相互借鉴思路，在不同中寻找相同之处，在分工中形成合作之力，从自己所熟悉的领域出发，对课题分化出的不同国别对象进行探讨。因为参加课题的所有人，都具有长期从事国际关系和国别研究的学术经历和较强的学术背景，因此都能很快地找到研究入口，将一个之前大家都比较陌生的课题按时做了出来。

本课题的分工情况是，本院刘宏松博士撰写第一章“中国国际组织外交：态度、行为与成效”；王联合副教授撰写第二章“美国国际组织外交：以国际刑事法院为例”；汪宁教授撰写第三章“俄罗斯国际组织外交”；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叶江教授、徐步华博士撰写第四章“英国国际组织外交的演变”；上海外国语大学外事处李云飞副处长撰写第五章“法国国际组织外交：历史与现实”；本院戴启秀副教授撰写第六章“德国参与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本人撰写第七章“日本国际制度外交理念与实践的历史变迁”；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研究院张贵洪教授撰写第八章“印度国际组织外交”；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张琪副教授撰写第九章“巴西国际组织外交：以运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为例”。

苏长和教授、韦宗友副教授以及《国际观察》编辑赵裴，一直参与本课题的讨论；本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研究生刘佳、杨光等学生在文稿的最终校对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范蔚文、编辑潘丹榕、韩梅梅在稿件的审阅和编辑过程中也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并给予了周到细致的关照，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如今课题已经完成，这是课题组全体成员集体合作与努力的结

果,也是我们对这一新课题的初步尝试。当然,也正因为是初步尝试,一定还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尤其是自己作为课题主持人,受知识结构和研究能力与水平的限制,使得这一研究在课题设计、课题组织和深化等方面还存在不少有待改进之处。不足之处当思改进,在此,祈请各位批评指正!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

武心波

2010年11月8日

目 录

丛书总序	I
前言	III
 第一章 中国国际组织外交:态度、行为与成效	1
第一节 中国对国际组织基本态度的历史演变	1
第二节 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勃兴及其行为特征	8
第三节 中国国际组织外交的成效	20
结语	26
 第二章 美国国际组织外交:以国际刑事法院为例	30
第一节 模棱两可的认知	30
第二节 犹豫不决的参与	35
第三节 案例分析:国际刑事法院	40
结语	43
 第三章 俄罗斯国际组织外交	46
第一节 以联合国为政治平台,树立俄罗斯的国家形象	47
第二节 竭力跻身“七国集团”,成为国际新规则的制定者	54

第三节	利用国际经济组织的巨大资源,推动俄罗斯的经济 发展	60
第四节	积极改善与欧洲关系,巩固区域主导地位	64
结语		68
第四章	英国国际组织外交的演变	74
第一节	从“光荣孤立”到借助国际组织支撑衰退中的大英 帝国	74
第二节	冷战时期以国际组织外交支撑“三环外交”	79
第三节	冷战后积极推进国际组织外交促使英国成为“全球 中心”	84
第四节	后冷战时期英国国际组织外交的国际动因及其作用 与不足	94
结语		99
第五章	法国国际组织外交:历史与现实	104
第一节	历史概述	104
第二节	法国对国际组织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影响与作用	106
第三节	法国的兴衰	108
第四节	战后戴高乐主义时期法国的国际组织外交政策	112
第五节	法国国际组织外交政策的民族主义特色及原因	122
结语		126
第六章	德国参与地区性和国际性组织	129
第一节	战后联邦德国对本国《基本法》和国际法的重新 认知	129
第二节	战后联邦德国参与区域国际组织的内外动因	131
第三节	德国统一对欧洲区域机制的影响	139

第四节 统一后德国的区域机制建制观	142
第五节 德国对国际组织政治议题的推动:以节能减排、金融 货币制度改革为例	146
结语	149
 第七章 日本国际制度外交理念与实践的历史变迁	151
第一节 奉行国家至上主义,挑战国际制度	151
第二节 以日美同盟为主导,全面融入美英主导的国际 体系	157
第三节 确立政治大国目标,急欲改变在国际体制中的战败 国地位	166
第四节 以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为契机,增强日本对国际制度 的主导作用	173
结语	180
 第八章 印度国际组织外交	183
第一节 从尼赫鲁到辛格	184
第二节 印度与联合国	191
第三节 印度与地区性国际组织	199
结语	203
 第九章 巴西国际组织外交:以运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 机制为例	209
第一节 巴西国际组织外交概述	209
第二节 巴西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中的表现	216
第三节 巴西实战策略及经验教训	223
结语	230

第一章

中国国际组织外交：态度、行为与成效

中国与国际组织的互动关系是伴随着中国对国际体系的接触和融入而发生的。自 19 世纪中叶被强行纳入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以来,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转变过程。与之相应,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基本态度经历了尝试性接受、相对排斥、有限参与和积极参与四个阶段的历史演变。在确立了积极参与的基本态度后,中国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了国际组织外交,并且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第一节 中国对国际组织基本态度的历史演变

一、尝试性接受(1949 年以前)

在被动卷入西方大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背景下,中国在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与国际组织进行了初步的接触。此时的国际组织正由欧洲地域扩展到全球。面对以多边形式开展外交活动的国际组织,中国全无应对和处理的经验。但相比于在与西方大国的双边接触中屡屡遭受的不平等对待而言,多边国际组织在形式上赋予了参与国更多的平等发言权。鉴于此,中国对国际组织采取了尝试性接受的态度。1897 年,中国加入了国际邮政联盟。1899 年和 1907 年,中国

两次向海牙会议派出了代表团。1919年,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参与了确立未来国际秩序安排的巴黎和会的谈判,并成为国际联盟及其附属机构国际劳工组织的创始成员国。然而,中国对国际组织的参与并未换得西方大国的平等相待。以镇压义和团运动为由,八国联军发动了侵略中国的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了条件极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在巴黎和会上,中国不仅没有获得战胜国应当享有的各项权利,还成为西方战胜国进行利益分割的对象。尽管如此,在日本于1931年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后,中国仍然作出了通过国际联盟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问题的尝试。中国向国联发起申诉,要求其根据盟约规定制裁日本。国联虽然派出了调查团并发布了调查报告,但调查报告偏袒日本,拒绝宣布日本为侵略者。¹国际组织并未超越权力政治的现实使中国在国际组织外交中屡受挫折。

国联的无所作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使诸大国认识到创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以保障世界和平的必要性。这个新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创建过程中同样深深地打上了权力政治的烙印。不同于以往的是,由于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以同诸大国相平等的地位参与了安排战后国际制度的谈判。经过数次会议的协商,各大国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表决程序达成了一致,设立了常任理事会的否决权机制。中国的大国地位得到了肯定,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为中国争取国际体系中的平等地位赢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使中国从屡受挫折的国际组织外交引致的失望心态中回转过来,积极参与到联合国组织体系下的多边外交活动中。1945年7月,在美国布雷顿森林举行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上,通过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1945年12月27日,该协定生效,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成立,1946年6月25日正式开业。中国成为世界银行的创始国之一。1947年4月至10月,中国政府应邀参加了在日内瓦由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主持召开的国际贸易与就业会议第二届筹备会议,与其他国家

共同发起创办国际贸易组织的活动,并进行了有关的谈判及《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拟定工作。当年10月30日,中国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上签字。1948年3月,中国又签署了联合国世界贸易与就业会议的最后文件,成为国际贸易组织临时委员会执行委员之一。1948年4月21日,中国政府签署了《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5月21日,中国成为《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正式缔约国。²

二、相对排斥(20世纪50—60年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拒绝给予其外交承认,并支持国民党政府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席位。在两极格局下,中国作出了“一边倒”的外交决策,选择了与西方国家处于对立状态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加强了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阻挠。

尽管选择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路线,但中国为自身获得更加广泛的国际承认并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作出了积极的努力。1949年11月5日,周恩来外长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哈尔夫丹·赖伊(Trygve Halvdan Lie)和第4届联大主席卡洛斯·罗慕洛(Carlos Romulo),并郑重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政府丧失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与事实根据,要求立即取消‘中国国民政府代表团’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1950年1月8日,周恩来再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要求联合国立即将国民党当局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³然而,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阻挠下,联合国大会在20世纪50年代,或者接受美国的提议,不予讨论驱逐国民党政府、恢复中国合法席位问题,或者支持美国提出的推迟这一问题的讨论。⁴随着亚非拉一些新独立国家不断加入到联合国中,美国提出的推迟讨论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主张遭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反对。1961年第16届联大总务委员会通过了讨论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

题的议题。这使美国不得不改变策略,联合日本、澳大利亚、哥伦比亚和意大利提出了将中国的代表权问题作为“重要问题”来对待的五国提案,并在大会上通过。⁵“重要问题”需要大会三分之二多数才能通过,这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得以继续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这一时期,中国对联合国持相对排斥的态度。中国对美国主导下形成的联合国政策和决议表示反对,但对《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则表示支持,并一直坚持其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权利。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还试图与其他一些国际组织建立联系,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初分别向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全球性国际组织提出了加入的申请,但都遭到了西方国家的阻挠。这使中国对国际组织的相对排斥态度进一步强化。由于参与主要国际组织的渠道被阻断,中国仅仅参与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国际组织和少数联合国体系外的功能性国际组织。比如1955年8月,中国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了由苏联等八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的华沙条约组织的一些活动;1956年6月,中国、苏联、保加利亚、波兰、朝鲜等十个国家共同组建了铁路合作组织;1957年8月,中国以世界大电网会议中国委员会的名义参加了国际电工委员会等。

20世纪60年代,中苏联盟的破裂以及国内左倾思想倾向,使中国的外交战略从“一边倒”转向“两条线作战”甚至到“四面出击”。受其影响,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努力失败后,中国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态度变得愈加排斥。中国将联合国视为帝国主义的政治工具,并呼吁建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来取代之。⁶出于对帝国主义的坚决反对以及对世界革命的热情支持,中国将国际组织也视为革命的对象。

三、有限参与(20世纪70—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中国对国际形势进行了重新评估,对外交战略作出了调整,以“三个世界”理论作为对外关系实践的指导。为应对